

山东自古被称为齐鲁大地,但齐鲁两国都仅仅是西周初年才被分封的,显然在此之前的夏商两代,这里还曾经活跃着不少其他的主人。在商代,齐地几乎一直是逢国的地盘。逢国名气不大,却和夏商周三朝的最高统治者保持着特殊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王朝的命运。

雄踞齐地

曾是东夷部落盟主

逢国的第一代国君叫逢伯陵,是炎帝的后代,虽然是商朝初年才正式受封,但逢氏一族早就是这里的实际控制者。别看今天很少有人听过逢国的名字,可在当时的山东地区,它绝对算大国、强国。逢国的领地包括现在的山东青州、寿光、临朐等地,此外,临淄、周村、张店等地也广泛流传着逢国的传说,几乎囊括了齐地的核心区域,可见其势力之盛。

逢国的昌盛并非偶然。作为土生土长的氏族部落,逢伯陵的先祖可以追溯到逢蒙。逢蒙是后羿的徒弟,史上留名的共有两位羿,咱们说的这位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虽然没有另一位大羿弯弓射日的本领,但也以擅长射箭扬名天下。

当时,夏王朝对地方的统治是比较薄弱的,而东夷部落的力量却很强大,雄踞一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位后羿活跃在夏朝的政治舞台上,一度以武力推翻了荒淫的夏王太康,掌握了夏王朝的大权。后来因为内部权力斗争,后羿最终被杀,据说他正是死在了逢蒙之手。

因此,逢蒙在夏朝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后羿死后,他手握重兵,成为东夷部落的实际控制者,人人都得敬他三分;另一方面,站在朝廷正统的角度来说,他无疑是替国家铲除奸佞、匡扶正义的大英雄。夏王复国后,显然要对他和他的族人大大加表彰,委以重任。

原本就是土霸王,又借着和中央王朝千丝万缕的关系,逢蒙后裔在山东地区的根基越扎越深,引得周边的一些部落相继依附和归顺,逢氏逐渐成为夏朝后期的东夷部落盟主,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力量。

部族的事业传到逢伯

逢国：从东夷盟主到周室国戚

【山东古国系列之十五】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陵这代已经是夏朝末年,面对各地揭竿而起,反抗夏桀暴政的紧张局势,逢伯陵做出了顺应大势的决定,果断倒戈,支持商人。在汤灭夏桀时,逢伯陵以盟主的威信带领东夷各部落,在对桀的战争中立了很大功劳。有鉴于此,商汤灭夏后,承认了逢伯陵的合法地位,正式把逢地分封给他,组建了逢国。有了名分之后,逢国得以延续自夏和夏之前的东夷部落盟主地位,替商王守好东大门。

逢山止戈

甥孝舅忠名传千古

逢伯陵和逢国作为齐国领土的前任主人,也给齐文化的形成做出了不少贡献。如今在齐文化发源地的淄水、潍水、汶水及泮水流

经区域内,还流传着逢伯陵的不少传说,他被百姓供奉为神仙,世代受香火供奉。

除了开国有功外,逢伯陵尤以忠孝闻名。中国传统文化有种人伦道德叫“外甥不打舅”,最初发端于商朝,此后世代延续,到唐朝甚至被写入了法律。在民间,舅舅在家族中地位特殊,往往是评断家务事的判官和主持人,并有“外甥打舅——不是人”“外甥打舅——情理难容”等歇后语。

而“外甥不打舅”的规矩据说就是从逢伯陵开始的。相传商朝有员大将叫杨骥,戎马疆场,屡建战功,受到朝廷的嘉奖。但是他恃功骄横,对朝廷的奖励不满,竟然率兵进驻青州境内的逢山,准备谋反。于是,足智多谋的商王派逢伯陵前去劝降叛军,逢伯陵正是杨骥的舅舅。

这杨骥虽敢造皇帝的反,却孝顺得很,听说娘舅来了,不免动了心思。他既不愿落个不孝之名,又不愿将义军拱手送给朝廷,颇为矛盾。杨骥深知,继续坚守逢山必然与舅舅同归于尽,不孝之名难脱。他急中生智,将山上的羊全部吊起,羊下面放上战鼓,羊因吊起挣扎,羊蹄不停地蹬在鼓上,发出鼓声。他又将饿马拴在槽边,把马蹄放在槽里,饿坏了的战马不停地刨着槽子,发出巨大的声响,这就是“悬羊击鼓”和“饿马刨槽”。一出空城计布置完后,杨王率义军从逢山西侧转移了出去,不告而别,从此放马归山,归隐山林,过起了平民生活。

逢伯陵听到山上击鼓阵阵、马蹄连连,一直以为外甥仍在山上。等到山上没有了声息,感觉不对,连忙带领士卒们上去,映入眼帘的却只有几只累死的羊和几匹躺下的马,哪里还有外甥的踪影。想到自己一生忠君爱国,到头来却见不到外甥,完不成商王交给的招安外甥的任务,倍感羞愧。他仰天长叹,毅然跳崖自杀,以谢王恩。

逢伯陵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到商都,逢伯陵杀身成仁忠心报国的壮举感动群臣,商王封逢伯陵为逢山山神,并下令在逢山上修建庙宇以示纪念。后来每到春天,当地官员都会专程前往逢山庙祭祀,平日里,老百姓也会前去祭奠。从此,外甥不打舅的传说也就流传

了下来。

西迁济阳

联姻周王乐享富足

到商朝末年,薄姑国崛起,逢国被迫西迁,搬到了济阳。不久,武王伐纣,重新分封天下,逢国的故土又从薄姑国倒到了齐国手中。此后逢国的状况,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许多人认为逢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一次考古发现却改变了这种看法。

早在1957年文物普查时,考古工作人员就在济阳县曲堤镇刘台子村西约200米处发现了一处西周墓地,不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对这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令人惊喜的是,四座西周墓葬出土了大量铜、陶、玉、石、骨和蚌器。墓地共出土了33件青铜器,其中有14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经过对铭文的解读,人们发现这里是一处周昭王、周穆王时期的逢国贵族遗址。

西周初年,山东地区并不太平。武王病逝时成王还是个孩子,东方的殷商遗民联合地方割据势力发动叛乱,想要推翻周朝的统治。分封齐地的姜太公一马当先率兵平叛,用三年的时间稳定了局势。为此,周成王命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在平乱过程中,齐国的领土不断扩大,大体包括今山东境内的黄河、胶济铁路和莱州湾三者之间的地方,其中的小国被一一消灭,而拥护周王朝的逢国却幸运留存了下来。

刘台子遗址中,一件“王姜作葬姒宝尊彝”鼎格外引人注目。从铭文可以判断,这件文物是周昭王女儿葬姒的陪嫁之物,而她的夫君正是逢国国君,可见逢国和周王室有着联姻关系,并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按照惯例,逢国国君也在周王室中担任着要职。

考古工作人员分析,刘台子遗址地势较高,周边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适合古人生活的好地方,逢国后裔很有可能就长期定居于此。从出土文物来看,实用陶器以及陶制品串饰普遍存在,证明当时制陶业非常发达,而海贝、绿松石、青铜器、玉器的发现也足以证明,当时逢国的贵族生活比较富足,虽然风光不再,但是逢国的国力仍不容小觑。



【镇馆之宝】

即墨市博物馆:

汉代金印“诸国侯印”

□陈敬刚

中国的印章文化博大精深,私印、官印、将军印、诸侯印、帝王印……无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其中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汉印的风格面貌对后世篆刻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即墨市博物馆,就珍藏着一方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汉代金质龟纽正方形刻印。

即墨市博物馆副馆长陈海波先生介绍,汉代金质龟纽正方形刻印有“诸国侯印”4字,印长2.5厘米,宽2.5厘米,高2.1厘米,重96克。金印为龟形纽,扁正方体。印面凿刻白文篆书,阴文篆书“诸国侯印”,四字端正清晰可辨,布局严谨。龟纽背部隆起,龟首向前探出,四肢外伸呈站立状,龟尾内收,龟甲饰有六角纹,边缘饰有一周圆纹,四肢均饰有鱼子纹。印文与形制带有明显的汉代风格。1986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即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从印的材质上来说,汉代印章主要以玉质和铜质较多,而金质汉印(纯黄金制成)则极为罕见。据资料记载,仅于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志贺岛,1956年在云



南晋宁县的滇王墓及1981年在江苏扬州的甘泉二号汉墓附近有过出土发现。而即墨市博物馆珍藏的这方汉代金印1977年10月出土于汉代泉虞县故地(今即墨市王村镇小桥村附近)。

不过,这件金印原本可能更重!陈馆长略带遗憾地告诉笔者,金印是在村民农耕地无意中发现的,由于当时锄头与埋在土的金印发生撞击,导致金印体表遭受轻微损伤,故而陈馆长认为该印的原重量应该在百克以上。

一般人读这方金印刻字会读成“诸侯国印”,但实际上是“诸国侯印”。据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罗福颐先生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记载:1977年山东即墨王村镇小桥村出土的金印,凿款“诸国侯印”四字,是十分罕见的西汉侯印。此印与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石洛侯印”同为金质、龟纽,大小相仿,唯字体笔画略瘦。于“石洛侯印”下云:“《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石洛侯,城阳顷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封。’《索隐》注:‘表在琅琊。’”汉武帝元狩元年为公元前122年。

小桥村一带为汉墓葬区,曾出土过西汉时期的彩绘陶瓷和陶鼎。据《汉旧仪》记载,丞相、列侯、将军授金印,皆龟纽。汉代设置诸县(今山东诸城西南15公里),其地隶属泉虞县(今青岛即墨境内)。据《即墨县志》记载,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册封胶东康王(汉文帝四子)之子炀侯建为泉虞侯,其后共传六世(共137年),至王莽篡汉时被废。

即墨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姜保国先生认为:汉代王侯一般葬于其受封之地,这枚金印与汉制相符,又出土于泉虞故地,故此应为泉虞侯印。“诸国侯”原意应理解为受封于诸县之侯,由于不好称“诸侯”故称作“诸国侯”。诸城与即墨只隔着胶州地区,相距不远,同属西汉年间的泉虞县区域,因此该金印在即墨出土是符合情理推敲的。该印的出土为研究西汉金印的发展史和即墨的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老照片】

父亲二次入朝

□刘剑侠

1952年3月,我父亲刘维布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141团奉命从朝鲜战场回到国内进行装备改装,部队先是在辽西的义县驻防。这时,我父亲被分配到炮兵营担任卫生指导员。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部队将先前的落后的装备全部改为苏式装备,大大提高了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和优良性。

当时,我父亲所在的炮兵营有3个连的建制,即76团炮连、57战防炮连和

120重炮连。76团炮连和57战防炮连用骡马牵引,而120重炮连则用汽车牵引。炮兵营的王营长、韩教导员、孙鹏副教导员、付朝刚参谋长等营级干部都配备了吉普车。我父亲所在部队卫生序列排级以上的干部也都新发了“五一”式手枪和十字挎包,使部队的装备水准大大提高。

部队改装后,我父亲所在的部队先后奉命开拔至辽东的庄河、新金等地驻防,上级要求随时准备



入朝作战。1953年的春节,正当国内的各家各户欢欢乐乐放鞭炮吃饺子的时候,我父亲所在的部队由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第二次进入朝鲜境内,继续与美帝作战。

1954年我父亲因朝鲜

战场恶劣的冷冻气候患上肺炎,经多家部队医院治愈后,回到国内继续在地方医院工作。1981年离休,2009年11月因患肺癌离世。

图为1953年元旦,我父亲刘维布(前左)与战友在辽宁新金合影。